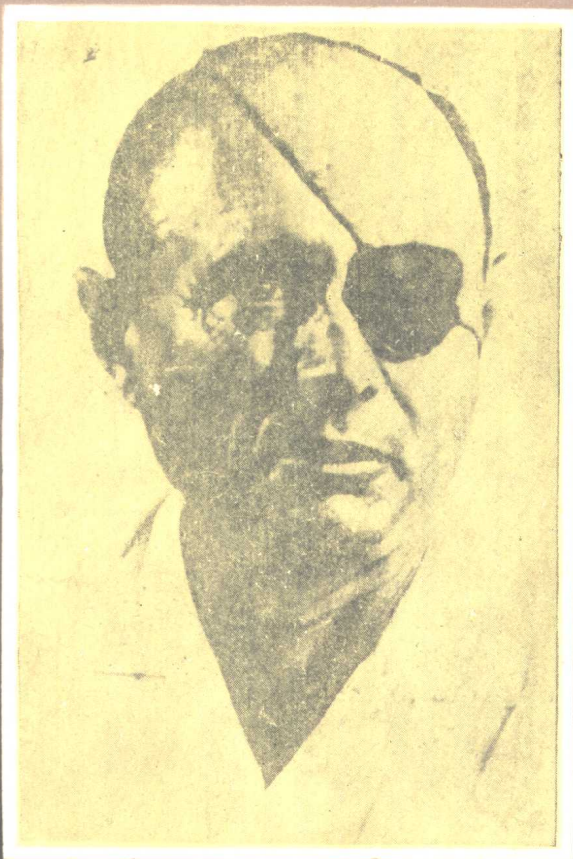




沙漠中的和平

达扬回忆录

沙漠中的和平

(——达扬回忆录)

[以色列] 摩西·达扬 著

张存节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oshe Dayan
PAIX DANS LE DESERT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1

根据法国法亚尔出版社 1981 年法译本译出

沙漠中的和平

——达扬回忆录

〔以色列〕摩西·达扬 著

张存节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 插页 字数 316,000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

书号：8188·74 定价：2.85 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摩西·达扬是缔结 1979 年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在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与萨达特的心腹秘密会见，首开谈判的是他；唯一参加了耶路撒冷、开罗、伊斯梅利亚、华盛顿、戴维营、利兹堡和布鲁塞尔等地的一切关键性会晤的人物也是他。他历任大军区司令、总参谋长、农业部长、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等职，在以色列的军队和政府中享有一定的声望，具有一定的影响。

1977 年 11 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导致了埃及—以色列和平谈判的开始，1979 年 3 月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当然，这个谋求和平的过程与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三十年阿拉伯—以色列对抗是迥然不同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这不仅在埃及、以色列和美国三方之间错综复杂地进行着，而且在阿拉伯世界中也发展为激烈的对抗。本书就是达扬就任外交部长后记述的关于这次艰巨而漫长的埃及—以色列和平谈判的全过程和有关一系列会晤的回忆，细节详尽，文笔生动，提供了谈判的第一手材料。作者在书中还对自己进入贝京内阁和后来辞职的原因作了详细介绍，明确地披露了他与贝京之间的矛盾，清楚地反映了贝京政府内部的分裂。所以本书虽然是从以色列角度写的，但对研究中东问题仍

不失为一份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材料。

本书根据1981年法国法亚尔出版社出版的德尼兹·默尼埃的法译本译出，原著所附关于作者在和平谈判过程中四处活动的相片，中译本未用。原著书名为《沙漠中的和平》，是作者继《达扬自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翻译出版）后写的一本回忆录，为醒目起见，译者加了一个副标题。本书脚注除注明中译者外，均为法译者所加。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蒙外交学院李直副教授对译稿进行了认真的审阅，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一、任命	1
二、起点	23
三、秘密会晤	36
四、摩洛哥会晤	54
五、预备性会谈	77
六、萨达特在耶路撒冷	105
七、马拉喀什会晤	128
八、起步	138
九、短命的政治委员会	153
十、在华盛顿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162
十一、利兹堡	194
十二、戴维营	209
十三、建议	224
十四、濒临决裂	236
十五、签字	253
十六、在国内的战线上	266
十七、布莱尔大厦	277
十八、气氛的变化	308
十九、危机	337
二十、二上戴维营	358

二十一、斡旋.....	370
二十二、白宫的庆祝活动.....	385
二十三、癌症.....	393
二十四、辞职.....	418
附录一 戴维营协议.....	445
附录二 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	462
附录三 两项协议备忘录.....	497
附录四 和平实现时,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地区 的居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将实行的自治 ...	501

一、任 命

1977年5月21日星期六的早晨，梅纳赫姆·贝京打电话给我，建议我到正在组建的内阁担任外交部长的职务。他创建了二十九年的反对党在本月举行的大选中获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而他正在为领导下一届的联合政府作准备。我参加的工党，自从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以来，一直是执政的党，这次失败了。我是作为工党提名的候选人被选入议会的，而要求一名反对党的成员担任内阁中一个关键职务的做法确是前所未有的。

我对总理说，如果他当场就两个问题给我作出保证，我将考虑他的建议，并在下星期二给他答复。一个是关于以色列主权的界限问题——我反对把主权扩大到六天战争^①时占领的，尔后由我们在管理的领土。贝京以一种我认为满意的方式阐明了这个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我的议员席位问题。如果我接受他的提议，我可以决定放弃这个席位，因为我是工党提名当选的。我保留这个席位，当然并未打破任何先例，但我希望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贝京回答我说，他不是为了在议会赢得一票而建议我参加他内阁的；即使我放弃自己的席位，他的邀请仍然有效，根据我们的组织法，

^① 一称六五战争，即1967年6月5日发生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译者

当议员并不是当部长的先决条件。

于是，我们结束了电话谈话。

接受呢还是拒绝？在后来的三天里，我的内心持续不断地展开了有生以来最艰巨的斗争。抛弃我的党而进入反对党的政府，这便是彻底同我在工党里最后的朋友决裂。再说，倘若我决定不放弃我在议会的席位，好让它重归于工党，我则将被指责为欺骗公众和背叛自己的党。以前，工党其他议员也这样做过——脱离工党，作为无党派人士保留自己的席位，这对我毫无益处。虽然穆尔德查依·本·波拉特、约那赫·凯斯、利奥瓦·埃利亚夫或夏纳·朗当可以得到原谅，但我是得不到宽恕的。赎罪日战争^①中牺牲的那些儿女的父母又会示威来反对我——过去那些示威并不是完全没有政治倾向性的，今后也肯定不会没有政治倾向性。到处会有人极力诬陷和诋毁我。

另外，我还要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如何同我将参加的这个集团取得协调。我能与贝京和他在政府中的同僚找到共同语言吗？当然，我觉得在政治问题上，我更接近他的观点，而不是我党领导人当时的观点，但我不是在一切方面都赞同他的。至于我们的社会观念，我是完完全全赞成搞社会主义农业定居点运动的。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共同的基本原则，那么怎样在贝京内阁中分担集体的责任呢？

^① 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进攻，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故以色列人称此为赎罪日战争；这个时间又适逢穆斯林的斋月，阿拉伯人又称为斋月战争。——中译者

促使我接受贝京邀请的主要理由是，我相信，作为外交部长，我可以在以色列的倡议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便同毗邻的阿拉伯国家，同居住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但我是否能有这样的力量呢？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否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可以向贝京，向阿拉伯人和向美国人提出来呢？

我那扎哈拉的家里气氛沉闷。表面上，日常工作在继续，但自那次与贝京通了电话之后，一连七十二个小时，我一刻也摆脱不了左右为难的困境。同意呢还是不同意？我征求我妻子拉赫尔的意见——她只能回答我说，她理解我对此事作出决断是何等的困难，但相信我肯定会作出正确的抉择。然而，她的眼神告诉我，她宁愿我不接受这个责任如此重大的职位，不愿我再次象赎罪日战争之后那样成为众矢之的，遭到诬蔑和侮辱，尽管阿格拉纳特委员会^①的报告已宣告我无罪，而受谴责的是参谋长和好几名高级军官。

我也没有忘记此问题中涉及个人的各个方面。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要看我对形势的分析是否正确。我觉得以色列即将面临一个总的关键局面。依我看来，萨达特当时表示愿意参加日内瓦会议，他是真诚的。我认为他希望和平，我在议会和在其他的公开场合都谈到过这一点。我是否对呢？如果是对的话，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的永久性边界就可得到保证。在这和平的进程中，美国人不可能袖手旁观，这是考验美国与我们的关系的时刻——包括对美

^① 调查赎罪日战争的委员会。——中译者

国犹太人同以色列国的关系的反响。

如果我们确实在走向和平谈判的阶段，下一个问题便是我对有关的问题是否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看法，是否可以用具体的建议表达出来使贝京能够接受呢？十年前，即1967年，当我们两人都在列维·艾希科尔的民族联合政府中时——列维·艾希科尔是在六天战争的前夕要求我们加入的，在我们同埃及和同叙利亚的边界问题上，我们的观点要比工党的观点温和。我们俩都认为，同这两个国家的谈判应该以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为基础。至于同埃及的边界的走向，我们的利益在于埃拉特湾航行的安全和自由；同叙利亚的边界，则在于约旦河水源的安全和保护。但是，对西岸方面，我们，贝京和我两人的立场比工党的立场更强硬，工党考虑在领土方面实行妥协的可能性：由约旦王国和以色列瓜分。这种解决办法如果是阿拉伯人提出来的，我们并不加以拒绝；我们甚至说，我们准备非常认真地来加以研究，但我们不相信有这种可能。利库德集团^①的竞选纲领声称，以色列的主权应该包括“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全部领土，而我主张以共处为基础作出安排，一方不要把主权强加给另一方。

过去，我是军队的总参谋长，后来在戴维·本·古里安的内阁中担任农业部长，接着又在列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的政府中任国防部长。那时候，我去找他们从来都不单纯是为了提出问题和听取答复。我总是带着自己对

^① 1973年由加哈尔集团、国家党、自由中心及人民党组成。该集团自1977年大选获胜执政至今。——中译者

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政治的和军事的建议去见他们的。这些建议有时被接受，有时遭到拒绝，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认为有人——甚至是本·古里安，我最敬重的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比我能更好地认清形势和了解需要采取的措施。因此，我自己从来没有认为我可以推卸责任，不去考虑我们应该采取哪种最好的办法。

同样，这一次我也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我确信，我的政治诊断是正确的。我认为，不久之后，以色列就应作出决定，明确自己的前途。我还认为，如果我参加制订政治路线，我将可以对这些抉择施加巨大的影响。

贝京打电话后的那个星期一，他病倒了，因此，约好我给他答复的那次会晤是在伊希洛夫医院进行的。他的医生要求我讲话简短些，我照办了。对于一些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我想确切了解他的立场，假如我在内阁占有一个职位的话，这些问题还会在内阁中引起冲突。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电话里提到过的主权问题。我曾提醒他，我们在立法选举之前的谈话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谈到可能在利库德集团的旗号下参加竞选。那个时候，他知道——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工党及其某些领导人使我失望；此外，自从1965年6月我跟随本·古里安参加分裂派建立拉菲党以来，我与利库德集团的关系是别扭的。六天战争六个月后，拉菲党并入了工人联合党（本·古里安仍留在外面），而我参加了列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的政府。1974年4月，我同梅厄一起辞职后，我

没有进入伊扎克·拉宾于同年六月领导的新工党联合政府。1977年选举的前夕，贝京的同僚就建议我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曾回答他说，如果利库德集团的纲领中包括一项保证，规定只要仍在同阿拉伯国家谈判，我们就不把以色列的主权扩大到由我们管理的领土，那么我就加入他们的队伍。

上星期天，我们在电话里谈话时我也曾提醒过他，但他不容分辩地说，这是老皇历了。我回答说，不，完全不是这样，由于他当时拒绝了我的要求，所以我就没有作为他名单上的候选人去参加竞选。这个问题我们肯定再有机会谈到的，而我没有改变意见。他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他邀请我担任一个部长的职位。他回答我说，自从在选举前和我谈话之后，他最后接受了一种提法，指出“在”谈判进行期间，不把主权扩大到那些领土。因此，唯一的区别便是他的“在”字和我的“只要”两字了。十分坦率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但在选举前却没有人向我谈到过他的提法。贝京给我解释说，这完全是传达上的毛病。我对旧事重提毫无兴趣，我简单地问他，我是否可以认为，他的提法对他即将组织的内阁具有约束力，到星期天我们在电话里交谈的时候，他给我作了肯定的答复。

这天，我在他病床前对他说，我准备接受他关于主权问题的提法，但应该予以公布。他准许我加以援引。

接着，我提到了日内瓦会议的问题，这个会议在上届内阁时就已经开始。贝京是否接受我们的观点呢？我们认为双方要无先决条件地参加会议，和平谈判应以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为基础。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不仅同意，而且

他还补充说，他的政府尊重其前任所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管理的领土上的阿拉伯人维持现状的问题。贝京同意他们可以继续向安曼议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并可以继续通过约旦这一渠道接受阿拉伯国家的财政援助。

在第四个问题上，我也得到了令人安心的答复：他将象果尔达·梅厄和伊扎克·拉宾的几届政府一样，不批准在耶路撒冷的哈拉姆沙里夫组织犹太人的宗教庆祝活动，那儿是位于公元前十世纪建造的圣殿^①原址的伊斯兰教地盘。他也不修改既定的关于在希伯伦的长老墓地祷告的规定，那儿是两种宗教的圣地，在窑洞上方的建筑物中，有一个犹太教堂和一个清真寺院。

医生不耐烦了，坚决要求我结束谈话。因此，我对贝京说，我接受他的邀请，而且我们商定了一份简短的公报：“贝京要求达扬在其内阁担任外交部长，而达扬已原则上接受。”

这项通告激起了一阵诬蔑和诽谤的浪潮。报上的社论、新闻界的书信和个人的来信都无情地批评我。拉赫尔沉默无言，双唇紧闭，难以承受这一切。而我，我预料到了这一切，因此我就不那么脆弱；再说，我过去经历中的创伤和瘢痕使我变得顽强了。我不问外事，在外界评说和我的内心世界之间拉上了一层帷幕，对那些要求我对我的抉择作出

^① 古犹太人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相传公元前十世纪为所罗门王所建，后被巴比伦人焚毁，公元前六世纪重建，公元前一世纪末由希律王加以扩建，公元70年又被罗马人毁坏。——中译者

解释的人，我也只是怀着厌恶的心情回答他们。

我出现在电视里，接受过几次报界采访，并答复了某些个人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写给约旦河谷的贝特泽拉基布兹^①的成员耶胡达·杜宾的。我们曾通信多年，有时见见面，谈谈政治。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他在长信中对我进行了指责和诅咒，但我知道他是真诚的，他就我站到反对党一边而给我写的信表达了很多人的心情。下面就是我回信中的一部分内容：

“我接受贝京的邀请，因为我没有勇气逃避我的抉择将使我本人和我的家庭遭受到的困难、辱骂、侮辱和孤立。我只是关心我们国家和我们人民的处境，我所见到的那种处境，因为以色列的边界及其本身的性质即将确定下来……要不是同阿拉伯人签订和平协议，那便有可能发生战争。一个没有我参加的贝京政府对以色列来说将会更好些吗？而如果我参加这个内阁，会不会有希望达到我们的目标——我心目中的那种目标呢？其实在我们同阿拉伯人的冲突问题上，我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出来呢？以及在这样的内阁中，我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观点去行动呢？如果对后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话，那么我是否应该仍旧拒绝贝京的提议呢？”

我也函复了加德·雅科比，他是工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信主要谈到了我的行为涉及工党方面的问题。当然，他

① 基布兹，即以色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组织。——中译者

对我是不留情面的，他用很多笔墨给我解释我在哪些方面给党的精神抹了黑。我简要地回复了他：

“奇怪的是，在你的信中少了一个词：以色列。在我决定接受贝京邀请的时候，我最关心的就是它，而且也只有它。我相信所有人都将看到，象我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国家可能面临多么严重的局势。我不能绝对肯定情况就是这样。我不想作详细的解释——而你自己和你的朋友们认为，唯一重要的事就是为我们的党和我们的议会保持正常生活，这也可能是对的。

“一个由贝京（以及他的政治观念、他的人格和他周围亲近的人）领导的以色列政府这一事实，加上美国对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态度，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所有这些因素使以色列面临了自1948年以来最关键的决定性时刻，这一项抉择将决定我们的边界以及其他很多东西。

“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接受贝京的提议，并和他一起工作，可以使形势朝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转变呢，还是拒绝他的提议，任命另一个人当外交部长对形势更有利呢？

“你可能有理由认为我本应该拒绝。但是，要拒绝的话，那除非我对问题有另外的看法，或者我不那么热爱以色列。”

我作出抉择之后，办了一些简单的手续。我告知工党，我离开它了；我保留在议会的席位，并从内务委员会得到了“一个只有一名党员的党的公认的权利”。

贝京组成了他的内阁，并于1977年6月20日通报议会。内阁中有利库德集团的成员(四十五名议员，议会共有一百二十名议员)，有全国宗教党的成员(十二名)，有以色列正教党的成员(四名)和我自己；几星期后，民主党(十五名成员)加入了联合政府。

经过例行的辩论之后，内阁以六十三票对五十三票获得了信任。此后，部长们相继上台宣誓，并到议会大厅中央的政府席位上入座。

投票前的辩论是在贝京发言之后立即开始的。他在发言中宣读了他的各位部长的姓名，并明确了他的主要政治路线。贝京发言之后，反对党的领袖和所有政党的代表都讲了话。我思忖着是否也发言。我不是非发言不可，其他部长也并不是非发言不可。我只代表我自己，当然可以缄口不言。况且，我对贝京说了，我丝毫不能肯定参加辩论。

会议开始时，有人告诉我，如果我发言，反对党的成员准备粗暴地打断我的讲话，甚至工党联盟（工党的一个派别）可能会集体退场。后来，有人扬言，我宣誓就职时会受到捣乱。面对这种情况，我的朋友们劝我不要发言，并劝我等待几个星期，让那些人的头脑冷静下来。

我本来可能会听从他们的，可是我突然想到，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想逃避难堪而困难的处境吗？因此，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决心参加辩论。我应该见难而上，而不应该逃避困难。

我仔细准备我的发言，尽管我不过以个人的名义讲话，我还是要求贝京证实一下在我们讨论过的两个政治问题